

■新作聚焦

徐锦庚《英雄山》：

英雄如山，书以铸魂

□王卓奇 贺彩虹

“英雄的山”与“英雄的城”

作为《英雄山》的核心意象，“英雄山”显然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集空间坐标、历史见证、精神图腾于一体的具象化标识。英雄山坐落于济南市区南部，原名“四里山”，因为安葬了无数革命先烈，被毛泽东同志命名为“英雄山”，这座山也因此成为济南乃至山东最具代表性的红色地标。从山脚的济南战役纪念馆一路拾级而上至山顶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这里的一碑一石、一砖一瓦无不凝结着厚重深沉的家国记忆，也点燃了徐锦庚的创作热情。他通过调查走访、考证资料等多种方式触摸历史的烽烟，用这本厚重之书纪念这座“英雄的山”和它所承载的“英雄的城”。

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到王尽美、邓恩铭并肩点燃革命火种，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齐鲁儿女浴血奋战，无论时代风云如何汹涌激荡，岿然屹立的英雄山一直都是这段峥嵘岁月的坚定守望者。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前赴后继，最终长眠于英雄山下，他们的光辉事迹是我们必须感念的精神遗产。正因如此，徐锦庚敏锐地将英雄山作为转喻对象，它不仅联结着重要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而且凝聚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自发而生的救亡意识和顽强抗争的精神。经过徐锦庚的细致描摹和深情渲染，苍莽峻拔的英雄山蜕变为记录山东革命历程的“活化石”，无形之魂与具实之峰得以相融共生，共同熔铸为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忠贞信仰。

报告文学《英雄山》正是以其同名场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景式、多角度、立体化展现了山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觉醒、革命、斗争、解放、胜利的完整过程，这既是对中共山东早期党史的系统梳理，也是对齐鲁大地英雄故事的潜钩沉。壮志凌云的浩然正气涤荡人心，绵延不绝的红色基因永续生辉，所有烽烟往事和英烈壮举都在书中一一定格。

写“英雄志”，显“英雄魂”

在叙事策略上，报告文学《英雄山》采用“核心事件辐射+时间线索串联”的拧绳式结构，将1919年至1949年山东各地波澜壮阔的革命伟业悉数囊括其中。在齐鲁红色史诗建构的主题框架下，徐锦庚力求实现宏观图景与微观细节的有机结合，既保证历史书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也避免让宏大叙事流于概念化和空洞化。比如在讲述济南战役的相关章节中，徐锦庚不仅从解放军指挥员的视角来展现战场上的紧张局势和惨烈情形，而且从当地支前民众的视角来描写他们冒着炮火运送物资和救助伤员的感人场景，让读者能够从不同维度深入理解英雄精神的丰富内涵，真正做到了以史立信、以情动人，荡气回肠的山河壮歌直击灵魂。

在人物塑造上，报告文学《英雄山》以王尽美、邓恩铭、刘谦初等革命先驱的生命轨迹为叙述主线，于字里行间构筑起共产党人忠贞不屈的精神谱系，处处彰显“英雄志、英雄胆、英雄气、英雄魂”。值得称道的是，徐锦庚以“大美”“不隐恶”的平视姿态勾勒人性底色，对每一个主要人物的家庭情感关系进行细致梳理，刻画出一组有血有肉、重情重义、至诚至坚的革命者群像。为了进一步增强作品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徐锦庚特别设计了一场王尽美和罗章龙游老商埠、吃把子肉、喝甜沫的闲笔情节，让原本遥不可及的革命者形象变得蔼然可亲。这种守正创新的文学加工不仅不会损害英雄人物的崇高地位，反而拉近了他们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揭示了英雄主义的本质内核——所谓的“英雄”，其实就是为国难当头之际选择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评论



在文体风格上，报告文学《英雄山》恪守着实事求是的真实性原则，并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发挥合理想象，进而实现了情理共进的文学性突破。作为一位报告文学名家，徐锦庚深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行文要义，以扎实详尽的调研采访为创作依据，确保相关事件和人物的真实可信，同时善用鲜活生动的场景、凝练传神的对话、真挚沉潜的情感等多种艺术手法，将枯燥乏味的历史资料转化为引人入胜的通俗故事。毛泽东同志曾亲切称呼王尽美为“王大耳朵”，徐锦庚不吝笔墨地追述了这一轶事，还原彼时彼刻的具体场景，使同志之间惺惺相惜的肝胆情谊跃然纸上。基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生活逻辑的辩证统一，并遵循“真实为体，文学为翼”的美学旨归，报告文学《英雄山》融合了纪实的质感和想象的灵韵，为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优秀范本。

和平年代，如何理解和传承英雄精神

《英雄山》全书通篇短句，语言通俗易懂，节奏铿锵有力，将真实的情感融入生动的画面，让读者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为那些铁骨铮铮的英雄洒下热泪。更为难得的是，书中辅以上百幅相当罕见的历史图片，包括但不限于手稿、信件、档案等，在留下珍贵影像的同时也记录了革命志士们的报国之情。从王尽美各地演讲的气宇轩昂到邓恩铭狱中写下的壮烈绝唱，从刘谦初弃教从戎的报国热忱到赵健民千里寻党的赤子忠诚，每一幅影像都述说着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每一段文字都镌刻着坚如磐石的英烈品格。

从历史下游漫溯而上，中华民族的英雄精神一直都是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沃土。在思想观念激烈碰撞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今天，《英雄山》不只是一部回顾历史的纪实，更是一本

大海土生土长的女儿

——读叶玉琳诗集《入海的长笛》

□陈培浩

情主人公与海边万物不断相互交融，又时有离合、互相凝视。诗人渴望融入大海涌动的无限风光中去，但又能分出一个自我来与大海对视，感受大海的馈赠、滋养和包容。读此诗，很容易让人想起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同样是以女儿的身份向更崇高辽阔的对象抒怀，同样是喷薄而出的情感裹挟着绵绵不断的意象，两位闽地女诗人都将自我与家国的血肉深情汇成激越嘹亮的豪迈诗篇。

正因为对大海饱含着深情，叶玉琳对海边的一切都有了诗性的发现。她看海边日出，发现“大海会长出翅膀/它有遮天蔽日的美/以蓝胜蓝，不动声色”（《海边日出》）；她从海水的味道感受到爱的哲理：“爱需要更大的容器/盛放海水的咸和酸/再接受月色的翩翩落下的微甜/一种新的凝聚，在更深的漩涡里”（《世间万物都是奇迹》）；她从一个海螺感受着春天的生机和本质：“一个海螺来到海边/去建造地久天长的家/赶潮的人加入仪式/大海再次经历飞行”。

《入海的长笛》勾勒了一幅生动的海边生命群像，一群世代代风里来浪里去的闽东渔民，在新时代追求着一种既古老又充满现代气息的美好生活。她细腻地刻画老船长的外貌和灵魂：“阳光反射着黝黑皮肤/一张褶皱的海图铺展/蓝色海岸很快要生出新事物//他最后一次弯腰/向大地祈祷什么/土拨鼠在身旁跑来跑去/温暖的土块和再生草环绕着/我嗅到了花香/海水，一样深沉的睡眠”（《老船长》）。诗人以白描和侧笔结合写出了每一个细胞都浸润着海盐气息的老灵魂的虔诚和热烈。她写“骑自行车赶海的女人/开始是三个，后来是四个、五个/跟在这些叮当响的铃子后面/跟在一连串狂野的笑声后面”，扑面而来轻快自然的生活气息。诗人善于以妙笔在质朴生活中挖掘出诗意：“海面很宽，可以容纳一生/希望这样的劳动一生两次/一次是在清晨，星星停留着昨夜的欢爱/大海还在睡梦中/另一次是在午后/海渐渐接近深蓝/大片大片的波浪涌向脚边”（《赶海的女人》）。叶玉琳也写晒盐的女人、渔村少年、码头搬运工……她写

报告文学《英雄山》用长达50余万字的篇幅书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齐鲁儿女从“五四”时期到济南解放近30年间的奋斗征程，以翔实的考证铺展历史，用凝练的笔墨抵达人性，用向善的情怀走近英雄，书中既有纵横捭阖的大视野，也有动人心弦的小细节，真实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不断交织、共振、奏鸣，共同谱写了一曲“青山处处埋忠骨”的英雄赞歌

凝心聚魂的红色教材，引导读者思考身处和平年代，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和传承英雄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英雄精神，从设立烈士纪念日到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再到加强烈士纪念馆设施保护，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优良风气已然在全党全国传播开来。置身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一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回望山东早期革命历史，无数英雄烈士在道与义的洗礼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在生与死的抉择中，上演一幕又一幕惊天动地、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悲壮史诗，这些刻在共和国丰碑上的往事如今因为报告文学《英雄山》的问世而焕发出新的光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徐锦庚与广大读者一道，从英雄山出发，跟随烈士足迹，在他们以身殉国的精神中寻找答案。

“这些英雄，有步月登云之志，有气吞山河之势，有海纳百川之量，有磊落奇伟之襟，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回眸英雄之路，我在想：他们走过的路，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道路缩影吗？他们的奋斗精神，恰与伟大建党精神高度契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徐锦庚带着自己对英雄精神的深刻感悟，沿着赓续传承中华民族红色记忆的正确路向，从中发掘符合当下审美期待的文化原型，并汲取有益大众的思想营养，进而创作出这部兼具历史典型性和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让革命者的信仰之光恒久闪耀，引领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积蓄奋进力量，续写英雄华章。

（作者王卓奇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贺彩虹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

■第一感受

一直以来，吴思敬总是以理论家的面目示人，然而大约自2020年起，他却接连在很多报纸发表了一系列回忆性的随笔，论及任洪渊、张志民、郑敏、谢冕、古远清、唐湜、朱寨、杨匡汉、张桐、骆寒超等诗人、学者，还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诗探索》等重要的团体与刊物。也许是因为“名家写名家”的缘故，这些文章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那些充满温情的追忆揭示了吴思敬近年诗学著述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侧面。文章不仅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往事，同时对于“诗歌”“德育”问题也颇有启发。

吴思敬的文章透露了朋友们不少饶有趣味的“隐私”，比如，任洪渊年轻时喜欢“赖床”打磨诗稿；谢冕外出开会还带着运动鞋，坚持晨跑、洗冷水澡；古远清因为没有学过拼音，发信息从来都是简洁的“电报体”。虽然过从甚密，但吴思敬和这些朋友们其实并不算同一代人。古远清、杨匡汉和他同属“40后”，除此之外，其他人大多年长他二三十岁，但是吴思敬和他们相识、往来却都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正值新时期文学初期，人们迎来了“重放的鲜花”，文艺界、诗歌圈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特殊的历史语境和文学潮流将这些“大孩子”“大朋友”们变成了“同代人”，他们彼此之间正是在这个时候结成“朋友圈”的。古远清曾戏称《诗探索》是“一群‘大孩子’办的文学评论杂志”，这些正值壮年的“大孩子”们有不少是在吴思敬位于菜场胡同7号的家里熟悉起来的。吴思敬回忆说：“王府井菜厂胡同7号，地处闹市，交通方便，我家遂成为诗人们常来常往的地方”“朋友们来我家喝茶、聊天、交流诗歌……有时忘乎所以，甚至在我这屋里举行即兴的朗诵会”“来访的朋友多，有时我不在，他们往往在门上留个条就走了”。这些生动的场景让人想起民国时期北京城内林徽因和朱光潜家中的文艺沙龙。关于新时期诗歌的发生和演变，以往的描述大多围绕诗歌作品展开，吴思敬和这些朋友们的交往则为历史增添了不少故事。

新时期“归来”诗歌在学界关注较多，但缺少有人关注骆寒超这样的“归来的研究者”。吴思敬在文中说，骆寒超“陆续为郭沫若、臧克家、徐志摩、戴望舒等诗人写专论，明知不能发表，却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在怀念张志民的文章中，吴思敬回忆道，他“与北京作协的几位青年诗人，如顾城、江河等关系非常好，成了他们的忘年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很多批评声音已然烟消云散，吴思敬的这些回忆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复杂性。

吴思敬深情怀念、致敬的朋友们都是几十年来的好友。他们因为共同的兴趣、志向而结缘，聚在一起释放出强大的创造力。新时期以来，吴思敬亲历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壮大，并且长期主持《诗探索》的编务工作，这使得他不仅成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坛重要的见证者、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还兼有组织者的角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是新时期以来最早成立的全国性文学社团之一，在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格局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在文章中，吴思敬细数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筹办、组织的历年年会和诸多刊物。他与张炯精诚合作、相互激励的经历让人钦佩，二人为当代文坛、为当代文学研究会一路走来的曲折经历也是许多人所不曾想到的。同研究会相比，《诗探索》40年的办刊经历更加传奇。在吴思敬关于《诗探索》的回忆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诗探索》柳暗花明的办刊过程涉及学者、书商、高校、出版社、印刷厂、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等各个方面；二是《诗探索》并不只是被动地挑选文章、提供版面，而是主动地、有意识地组织话题。1994年，《诗探索》的复刊号上临时加了一组“关于顾城”的文章，意在“提供顾城事件的真相，表明我们的看法，供诗歌界与社会各界读者参考”。在此后30余年中，常规的、非常规的专栏还有许多。人们往往把文学史理解成一个自发、自足的过程，但从这两点不难看出，文学现场、文学史是多方互动和作用的结果。

当年一起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朋友们有几位已经离世，悲痛与缅怀是促使吴思敬写下这一系列文章的主要原因。他对亡友们的品行给予高度评价。在称赞老友们人格风范的同时，吴思敬打趣杨匡汉是“书呆子”，同时又“爆料”自己也是“书呆子脾气，一边等人，一边窝个地方看书”，害得任洪渊夫妇久等。他借用林庚的说法，称赞朱寨是一位具有“布衣气质”的学者，这放在他自己身上也很合适。他平易近人、爱护后辈。我曾不止一次陪同青年学者、作家到他的客厅做客。正是因为彼此性情上的这些相近、相似之处，才使得吴思敬和这些朋友们惺惺相惜。

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吴思敬的诗学思想中饱含着宝贵的诗教思想。受人民教育出版社之托，吴思敬主编了高中选修课教材《现代诗歌散文选读》。谈到“诗歌教育”，吴思敬引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认为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句话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修其辞而立其诚”“身教胜于言传”“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这其实道出：诗教和德育是相辅相通的。优秀的诗歌作品一定是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的道德也是如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诗德合一”无疑是值得肯定并且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也是吴思敬的回忆文章给予人们的启示。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

致敬友谊，钩沉历史

——读吴思敬的近代作随笔

□冯雷